

卫生问题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雷 鸣

摘 要: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关键词: 乡土小说;“农村新人”;卫生;文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4-0151-07

所谓“农村新人”,是中国乡土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而塑造的、走在特定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典型新式农民。他们的思想品质、行为方式、身体形貌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社会制度和国家形象的想象^[1]。只要论及“农村新人”形象,学界通常认为,此类“新人”形象仅仅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投射,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精神特征。但如果深入考察,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农村新人”,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在表现视角、话语资源、情感经验、艺术手法等诸多方面,均有着自己的独异性。这些“农村新人”形象显得更为丰富与复杂,在彰显改革时代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携带了许多当时乡村生活的信息,传递出文学转型的诸多迹象。

考察这类“农村新人”形象,不难发现,诸多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他们个人的卫生习惯问题,比如他们都有刷牙的习惯、身体散发出香味、所穿的服饰亦很干净等。本文拟从这些琐碎、世俗的日常生

活中的卫生问题入手,探讨它们何以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表意装置,何以能成为表达改革意识形态的场域,由此,进一步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对现代化的理解、对时代主题的表达策略,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乡村生活的丰盈情态,发掘这类“农村新人”形象所显露的文学转型意义。

一、刷牙:“农村新人”作为挑战的方法

古代中国人的口腔清洁方式,未能见有刷牙的记载,似乎都是以“漱口”或“擦牙”的方式。不少古代小说对此多有描述,冯梦龙的《醒世通言》中有《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篇,叙述卖油郎秦重头回宿于花魁娘子处,早起后离开,“丫环捧洗脸水进来,又是两碗姜汤。秦重洗了脸,因夜来未曾脱帛,不用梳头,呷了几口姜汤,便要告别”^[2]。这里呷姜汤乃漱口之意,并无其他净口与刷牙的举止。《红楼梦》中也有关于牙齿清洁的描述,如第二十一回写贾宝玉

收稿日期:2022-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史视野下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重释研究(1942—2021)”(22BZW164)。

作者简介:雷鸣,男,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27)。

清早起来,到了黛玉的屋子里,就湘云的残水洗完脸后,“忙忙地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3]。以盐刷牙,与现代人用牙粉、牙膏之类的刷牙殊为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刷牙传入中国,当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开始设立牙科,西方先进的近代口腔医学理论与技术,以及以西法制成的牙粉、牙膏、牙刷等物品,也陆续传入中国。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和地理空间闭塞之故,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刷牙对于农民而言,仍是一种罕见的行为。据1989年第一个“全国爱牙日”(1989年9月20日)的调查,当时不刷牙的人群约占70%。到1995年调查时,仍有28%的人不刷牙^[4]。由此观之,刷牙作为日常卫生行为,被赋予了卫生现代性的丰富内涵,表征着现代文明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依然有着现实基础。

正因为刷牙这一行为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而存在,这一生活细节常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被演绎成为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开放与封闭不同话语冲撞与交锋的场域。这种叙事套路最早出现于古华1981年发表的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中。被打发到绿毛坑林场的知识青年李幸福,之所以在小说中被视作现代文明意识的化身,主要表征是他每天早晨都要刷牙漱口。刷牙与李幸福收听广播、读书、写字一样,代表着一种现代文明生活。愚昧、狭隘、保守的王木通,则制止妻子盘青青和孩子们刷牙,拒绝他们与李幸福接触。

古华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思考,不是侧重于塑造“农村新人”形象,而是着墨于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所不在的顽固性,新的生活向往却窒息于强大的传统习俗之中,因而小说中的“刷牙”带有几分历史沉重的悲剧意味。饶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刷牙,在路遥小说中却濡染着对未来的乐观情绪,成为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挑战乡村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的一种方法,传达着他们在改革年代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别样的人生追求。《人生》中的高加林,即便因为失去民办教师的岗位而陷入极度苦闷悲伤之中,也不忘蹲在他家的硷畔上刷牙。他要和以高明楼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一比高下的决定,亦是在刷牙时做出的:“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他把缸子牙刷送回窑。”^[5]²⁴⁰当他第一次亲吻刘巧珍之后,对巧珍唯一的叮嘱是:“以后,你要刷牙哩……”^[5]²⁵⁷于

是,小说第六章便描写刘巧珍刷牙时被围观的情形:“这天早晨,她端着牙缸,又蹲在她们家的硷畔上刷开了牙……这时候,碰巧几个出山的女子路过她家门前,嬉皮笑脸地站下看她出‘洋相’;另外一些村里的碎脑娃娃看见这个女子被围在这里,不知出了啥事,也跑过来凑热闹了;紧接着,几个早起拾粪路过这里的老汉也过来看新奇。这些人围住这个刷牙的人,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5]²⁵⁸面对众人的围观,刘巧珍还有意赌气地多刷一会儿,让他们看得习惯:“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清水,漱了漱口,把牙膏沫子吐在地上,又喝了一口水漱起来。周围一圈人的眼光就从那牙缸子里看到她的嘴上,又从她的嘴上看到地上。”^[5]²⁵⁹刘巧珍有意挑战围观者的刷牙行为,便具有了抗议传统生活、向往现代文明的文化意味。很显然,具有传统色彩的乡村女性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勇敢的举动,正是由于有了“新人”高加林的激励。在“新人”巨大爱情动力之下,刘巧珍将刷牙作为有意挑战乡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壮举”。

与此类似,《平凡的世界》中也特意写到了孙少平的刷牙行为。在黄原地区参加革命故事的“调讲会”之后,孙少平思想和理智显得更成熟了,精神世界丰富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省下的一点零钱,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6]¹⁷⁷孙少平的刷牙行为,成为他精神世界丰富起来的表征,暗示着他对生活有新的更大向往。

路遥在不同小说中都刻意强调“新人”刷牙的生活习惯,或者“新人”引导别人刷牙的行为,是想通过刷牙为“新人”设置一种在传统中突围的具有乡村气质的路径。这种挑战传统的路径设置,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合理性。这一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北农村闭塞、落后的真实境况的映现,刷牙在彼时的乡村尚属个别有文化的人所为;另一方面也传递了青年农民高加林、孙少平为了“自我实现”,渴望走出贫瘠乡村、向往城市的行为的现代性逻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刷牙还能成为一乡村传统视野中的“西洋景”时,足见当时乡村传统的滞重,对于现代文明还是一种遥远的展望状态。

如果说路遥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新人”的书写,是通过刷牙为“新人”提供了一种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那么贾平凹则通过刷牙标示了乡村中“新人”与“旧人”两种价值体系的分野边界。“新人”除了具有改革时代所呼唤的精神品质之外,他

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刷牙,这个刷牙也正是新人生活方式不同于乡村传统的重要表征。保守的“旧人”则从不刷牙,反而嘲讽“新人”的刷牙行为。这样的“旧人”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财富增长上,最终都会落败于“新人”。《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是一位有见识、敢闯荡的乡村改革“新人”,他不甘心土里刨食,不满足于传统小农经济的温饱生活,而是执念于借助科技发家致富。小说有意设置了刷牙这一情节单元来表现。禾禾在部队上养成了漱口刷牙的习惯,复员之后,每天在大门前刷牙。禾禾刷牙的举动亦影响着烟峰,她也学着禾禾的样子,用盐水漱口。而小说中另一位男主人公灰灰老实巴交,勤勉于地里的劳作,被视为乡村改革的“旧人”,他对禾禾的刷牙则是讥讽:“禾禾呀,你当了几年兵,洋玩意儿倒学得不少,那嘴是吃五谷的,莫非有了屎不成?!”^[7]³⁴⁷当妻子烟峰要给禾禾买牙刷时,免得已经掉了一颗牙再掉,他却说,都掉了就镶金牙。这里,禾禾“刷牙”这一行为被作家处理成了改革话语交锋的场域。当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以“刷牙”启动现代性改造工程时,“旧人”在显示农民式的狡黠之余,也体现出这种乡村传统观念代表人物的滑稽与可笑。

二、体香：“农村新人”改革立场的指认代码

一个人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包括可以察觉到的呼吸和汗液气味,以及人工香气(个人使用过的香料、洗涤剂 and 涂抹剂等)。身体气味具有辨识和区隔功能。“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职业、卫生状况对其身体和气味产生影响,而身体气味随不同文化与人类群体变化,为个体的人提供了定位标准。”^[8]³⁵⁻³⁶除了这种个体辨识功能外,体味亦是区分不同群体的标志之一。“同一种气味,标志着某一个体隶属某一群体,有助于该个体融入该群体,表示该个体与其他群体无关,并在该个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立起一道屏障。因此,气味也就成了种族歧视、社会抛弃甚至道德抛弃的工具和证明,或简单说,是标志。”^[8]³⁷

身体气味承担辨识和区隔的功能,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均有表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人的气味往往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品格操守的象征。正如《颜氏家训·慕贤》中所说:“与善士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

臭也。”道德的善恶对应于人体气味的香臭,还有唐刘禹锡之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亦是如此。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的身体气味也同样是包含多维意义的文化符码。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克莉奥佩特拉的身体散发着异香,指称着梦幻、情欲与异域风情。

在中国革命文学的话语系统中,身体气味通常喻示着人物的政治立场与阶级归属。延安文学时期,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土改积极分子张裕民总是“一身汗味”,落后分子寡妇白银则浑身脂粉味儿。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勾引杨老疙瘩、地主韩老六的女儿韩爱贞的气味是从她的衣袖里、头发上冒出一股香气。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亦然,比如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汉奸、特务王柬之的情妇淑花与日本翻译官的情妇婵子身上都是脂粉气息,在八路军军工厂工作的纪铁功则是满身油污味。浩然的《艳阳天》中的支书萧长春为了农业社奔忙,满身散发着露水的潮湿气味;贪污集体公款的会计马立本则嫌弃贫农五保户五婶“怪气难闻”。这里,政治上反动的阶级的身体气味往往是香的,革命阵营的人则多散发着汗臭味。

如此身体气味与人物政治立场相联结,可从中国革命实践历史中找到答案。首先,中国革命事业所依靠的主体力量是工农兵,他们属于劳动阶层,身体散发汗臭味,正是劳动的具体表征,劳动则是革命性质的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赋予了劳动所具有的政治立场与阶级归属:“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反之,如果身体满是香味,则意味着追求物质享受、脱离劳动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之香便成为一种罪恶的证明与剥削阶级的标识。其次,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物质的腐蚀性保持一种警惕。例如,当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时,毛泽东便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0]在战争年代,基于物质的稀缺性,革命者唯有淡化物质情感,将物质社会理想化为革命的乌托邦远景,才能激起革命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发展生产与经济建设方面的压力,“劳动光荣”不得不压制“物质消费”。正是革命话语系统中的反物质性,淡化个人生活享受,为革

命劳碌、奔波,便成为革命者的“应有之义”。由是革命者无暇顾及身体个人卫生,散发汗臭之类的气味,便是确证革命者的一个重要维度。

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身体气味的隐喻内涵发生了具有颠覆性的转变。与革命战争话语系统不同,此时身体气味之香不再归于批判之列,而是成为“农村新人”的专属“体味”。凡是契合改革的时代精神以及具有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的人,其身体气味自然是香的、清新的;体味酸臭的人,则归属于传统的“旧人”,其立场取向、价值观念也是传统、落后与守旧的。贾平凹《小月前本》中的门门脑子活、观念新,有股子闯劲,是改革弄潮儿的形象。在女主人公小月看来,门门总是收拾得很干净、气态风流,因其符合改革政治的需求,体味自是富有魅力;而那个忠厚、勤劳但死守着土坷垃要吃喝的才才,无疑是落伍的,因而只能散发出没日没夜在地里干活所带来的酸臭味,“披一件白粗布衫子,衫子的后背全汗湿了,发着热腾腾的酸臭味”^{[7]233}。同样的叙事成规,亦见诸《鸡窝洼人家》中。改革的“新人”禾禾,在烟峰眼里,比传统、保守的灰灰干净:“闻闻你身上,快臭了!……禾禾和你不是一样的下苦的,可哪里像你!”^{[7]344}这里通过对比,将禾禾所具有的改革时代意识体现在日常生活维度上。这种以身体气味之香来指认“新人”具有改革时代所呼唤的现代特质的叙事策略,还见诸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巧巧对“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持乐观的态度,对集体劳动不复存在没有太多惋惜之情,于是,小说叙述她身上有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儿。郑义《老井》中的赵巧英一心向往城市文明,盼望离开愚昧的乡村,她除了在穿着上追求城市时尚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特征,便是身体有浓郁的香气:“你闻闻,香呀不香?比这洋槐花儿香啵?”^{[11]11}

路遥的小说《人生》不仅征用了身体气味,而且有意识地放大了“新人”所具有的魅力。刘巧珍是一个善良、传统、没有文化的乡村女性,对“文化人”高加林爱得无怨无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她痴迷于高加林浑身的香皂味。“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再说,又爱讲卫生,浑身的香皂味!”^{[5]251}卢卡奇曾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2]日常生活现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以特定的方式融合于个人日常

生活现象之中。“浑身的香皂味”竟然成为乡村女性迷恋的一种原因,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现象传递了时代总体的真实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乡村的不少地方是极端贫困与封闭保守的,香皂对不少农民家庭来说还属于罕见物,具有现代文明符号的性质。作为乡村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加林身体能散发香皂味,正象征着他具有现代文明气质,是一位迥异于传统农民的“农村新人”,是一位代表着时代变革的先行者。

乡村改革话语何以借助身体气味来指认“农村新人”的价值立场,这需要从改革的意识形态内涵出发才能得以解释。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语境中,面对国民经济陷入窘境的局面,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指向十分明确,即是大力发展经济,从而积累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物质基础。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便是以工业经济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由于其效率低下、脆弱性等不足,处于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边缘。“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1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肯定个人的经济权利,重申物质欲望的合法性。身体气味之香,除了经常性的沐浴习惯之外,离不开工业化的洗涤用品或化妆用品的使用。因此,身体气味的香,也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拥抱与实践,而这正是当时改革的现代性追求,自然归属于“新人”之列。小说中所书写的那些身体发出汗酸臭味的人,通常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类人,他们仅满足于乡土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酸臭的身体气味自然指称着他们是落伍、保守的人物,这也表明改革之初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身上有香皂味的高加林、有香水味的赵巧英等“新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渴望逃离乡村,向往城市文明,追求自我主体实现。

三、衣净:“农村新人”文化觉醒的表征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除了具有实用、遮羞、美化等有形功能之外,还有作为一种表意符号的文化功能,即能够传达着装人物的等级序列、性格情趣、文化修养等内涵。诚如罗兰巴特所说:“一面是

样式、布料、颜色,而另一面是场合、职业、状态、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monde)。”^[14]

不仅如此,服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直接的,服饰能够传递生活变迁的脉络,反映社会变迁的形态。“服装随心所欲地变化,在世界各地揭示社会对抗的剧烈程度。”^[15]可以说,服饰是窥探社会、思想与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战国时代赵武灵王的变革即是从服饰开始的,所谓“胡服骑射”即如此;巴尔扎克把法国大革命比喻为一场丝绒与羊毛之间的斗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易木屐为皮鞋,改和服为西服,正是日本全盘西化之变革的缩影。新时期之初,服饰同样标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气候”,西装、喇叭裤、高跟鞋的逐渐流行,一改过去服饰灰、黑、蓝的色彩基调,预示着沉闷、滞重的社会氛围被打破。

基于此,借助服饰书写塑造人物性格、编织情节链条、建构象征意蕴、传达意识形态,已然成为不少文学作品常见的叙事策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此类作品不胜枚举。张爱玲的《金锁记》描写主人公曹七巧刚出场时,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银红”“葱白”“雪青”“闪蓝如意”等服饰颜色,暗示了此时的曹七巧年轻、富有活力而又情欲压抑的心态。又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叙述主人公王琦瑶的每一次出场,都是款式不同的旗袍,喻示她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嬗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服饰往往承载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容,杨沫的《青春之歌》开篇写林道静穿着全是素白的服饰:“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16]服饰色彩的白色,代表着林道静处于“纯洁的、混沌未开的、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之中”^[17],需要革命者启蒙,需要党的引领促其成长。新时期之初,刘心武的《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借助“米黄色”“红色”等服饰色彩的独异性,宣示着处于时代转型期的青年重建个人主体性的努力。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中,服饰话语仍然是表现乡村变革的有效断面。20 世纪 80 年代乡村之变投射在农民的服饰变化上,是彼时乡村的真实情形。贾平凹对此有直观的感受:“今年又去了一趟,有许多使我吃惊的变化,所到之处,新房新院新门楼,人们衣着整洁,面色有红施白……再不见穿有石榴皮和靛蓝自染的土布衣服,一些老汉们穿商

店的裤子虽然心疼‘一边穿磨损浪费’而将开口换到后边,下蹲艰难,受年轻人耻笑,但毕竟穿了机织布,最差的是咔叽料的。”^[7]¹⁶⁶但在当时的乡村,“致富光荣”的口号刚开始流行,“万元户”之类的新富农民尚属少数。虽然农民的服饰较之改革前发生了变化,但从服装面料、款式、穿着方式等方面看,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与城市居民更是存在着显明的“差序格局”。

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作家们并不注重书写服饰的色彩、样式、布料等方面,而是侧重于叙述着装人物服饰的卫生问题,服饰的洁净与肮脏,分别表征着传统与现代、“新人”与“旧人”之间的文化认知状态。《人生》中多次写到高加林穿上干净衣服的情形,在刘巧珍眼里,高加林被认为是一个有文化又精神很丰富的男人,其主要原因,除了他会吹拉弹唱、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之外,还在于“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5]²⁵¹。《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虽然衣服破旧,但总是努力地穿得很干净体面。即便是去见好朋友金波,他也得把烂衣服收好,换上干净的新衣服。这暗示着孙少平重建主体的心理状态,农民并不就是脏烂的形貌。孙少平的叔叔孙玉亭迷恋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是个有着扭曲人格的乡村“政治运动迷”。这样一个逆乡村改革潮流的形象,小说配置给他的服饰是破衣脏鞋:“不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世事变了,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18]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作家进行着改革意识形态的考量,契合改革时代精神的“新人”,服饰才能有整洁的资格,能在各种竞争中胜出;反之,服饰不整洁的,通常摆脱不了被淘汰的败局。在《小月前本》中,只有头脑灵活、具有市场意识的门门才会收拾得干干净净;而木讷、愚笨的才才必须是动辄一身粪泥,白衫子变得灰不溜丢、皱皱巴巴,有些像抹布。在爱情竞争中,他必然是败给了干净的门门。同样在乔典运的《满票》中,年轻的王支书观念先进,认为新社会就应该让老百姓享福,小说写他总是穿干净的衣服,每天刮脸又梳头;原来的大队长何老十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在他看来,穿戴好一点、新一点,不是资产阶级也必定是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故而他总是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黑土布袄子,腰里勒着一根皮绳,结果在村长选举中,他只得了两票,有一票还是自己投的。古华的

《蒲叶溪磨房》中的赵玉枝,坚持讲经济规律和制度,又懂技术,帮助退伍军人莫凤林开办磨房,还敢于穿着泳衣在蒲叶溪里游泳,显然是改革时代的“新人”,小说多次写她穿着洗得干净的黑色紧身尼龙衣。同样,在爱情竞争中,她打败了大队支书的女儿杨叶叶。

这一时期乡土小说中塑造的“新人”形象,在穿着上都是洁净体面的,那么与之对应的是,一些还停留在反改革的旧文化认知框架中的“旧人”,其穿着则必定是邋遢的。何士光的《乡场上》中的罗二娘,仗着丈夫是食品购销站的会计,多年来在梨花屯乡场上狠毒、霸道,经常以污言秽语欺辱其他乡亲。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落实、农村市场放开之后,她依然如故,还把自己当成“贵妇人”。小说有意以新时期开始觉醒的农民冯么爸的视角,呈示罗二娘服饰肮脏的样貌:“你看她那妇人家的样子,又邋遢又好笑是不是?三十多岁,头发和脸好像从来没有洗过,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上面有好些油迹,换一个场合肯定要貽笑大方。”^{[19]135}横行乡里的罗二娘,在乡村改革的年代,仍然沉迷于过去特殊年代形成的一点特权之中,其服饰自然是邋遢的,整个人物也归于“过去”之列。何士光的另一篇小说《故乡事》也与此类同。小说中的米贵嫂不敢穿好衣裳,对沾着一点职分的人都忍气吞声地不敢得罪,这些行为属于改革时代之前的“愚昧”旧生活,因此小说写她的服饰亦是不干净的:“终年穿在身上的,都是补缀了的、褪尽了颜色的布衫,满是灰烬和一圈圈银色的汗渍,并一直敞开着歪斜的衣领。”^{[19]214}

这种把服饰纳入乡村改革的时代政治议程的写法,以服饰的穿着状态隐喻性地表征了“农村新人”的文化觉醒,与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悠然会通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礼教对服饰的要求极为严格,将其视为一个人立足于世的重要条件之一。《大戴礼·劝学》所记孔子之语云:“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回顾近现代历史,诸多社会变革莫不从服饰开始。在“戊戌不缠足会”“民权革命”“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社会运动中,服饰或者作为社会习俗与生活的方面,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或者被视作道具,成为社会变革的形式与手段。从人物所穿的服装切入,书写“农村新人”的精神觉醒与文化认知范式的更新,不仅顺应接续社会变革的历史逻辑,而且合乎人性逻辑。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根据不同人物的服饰穿着状态,而相应地赋予其精神

与文化认知的写法,使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在塑造“农村新人”时,平添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底色与韵味。

结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的目光更多地锚定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等大问题,当代文学中的世俗生活话语长期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即便新时期文学转型从写“伤痕”开始,在反思历史中达到高潮,但也是从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控诉、反思与审视。城市工业题材的改革小说虽然瞩目于改革的进程,介入现实的意识非常强烈,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写法,很容易就滤除了“毛茸茸”的世俗生活气息。而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关注“农村新人”的刷牙行为、身体的气味、服饰的洁净程度等卫生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对乡村生活的世俗化呈现。这种世俗化呈现对新时期文学转型十分关键,标示出一个新的文学发展方向。

具体言之,这一时期的乡村小说不厌其烦地书写农民个体的卫生问题,坦然而合法地描绘刷牙、体味、着装等日常生活,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诗学重构。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聚焦民族国家或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专注于政治理性与革命激情的群体化生活书写,平淡无奇、充满程式化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要么缺席,要么仅为宏大话语的注脚,为政治逻辑所重构。这些乡土小说虽然也使用了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改革政治话语,但作品要表达的主题逻辑,却是着力展示了改革政治渗透、影响到乡村,引起农民世俗生活的变化与波动。从这个角度看,农民的日常世俗生活成为叙述的主体和表达的着力点。“卫生是这些原则的总和,卫生的实行是为了保持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和道德,破除疾病的根源,使人身心高贵。总的说来,卫生包含了全部的精神和道德的世界。”^[20]正是对农民个人卫生问题的观照,小说所描绘的改革语境下的乡村生活才具有鲜活与灵动的质感,“农村新人”的生存形态与精神面貌亦显得更加丰盈与复杂。

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刷牙、身体气味、服饰的洁净程度等感官体验书写,与中国改革现代性的表达建立了一种隐喻联结机制,显示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新的艺术“可能性”。刷牙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场域,映现出“农村新人”反抗传统的方法,其身体的香味、衣服的干净整洁,内含着对“农村新人”的

价值立场的指认,是一种文化觉醒的表征。这种建构感官体验与改革政治之间的隐喻机制,使得中国文学在处理国家民族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时不再那么机械、呆板与干瘪,而是具有了更为生活化、人性化的模式。这也标示着当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开始从道德理想主义的理念说教转向世俗人文主义的感官化书写。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在塑造“农村新人”时,注重农民个人“卫生”问题的书写,既拓展了当时改革文学的创作路径,又使得对时代典型的塑造增添了诸多生活化与人性化的向度。正是这种塑造“新人”的方法,在不经意之间存留了当时诸多的乡村生活信息,昭示了新时期文学转型的特征。这种贴近农民个人生活的乡村叙述方法,对于当下作家如何鲜活而实在地表现 21 世纪中国乡村,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兴阳.“农村新人”形象的叙事演变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麦河》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5(4):80-87.
- [2] 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37.
- [3]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80.
- [4] 李青奕.口腔保健指南[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25.

- [5] 路遥.人生[M]//郑电波.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第七卷.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14.
- [6]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 1 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77.
- [7]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第 11 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8] 勒盖莱.气味[M].黄忠荣,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 [11] 郑义.老井[M]//郑电波.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第 15 卷.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14:11.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
- [13] 卢周来.穷人经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78.
- [14]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9.
- [15] 费尔南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67.
- [16]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
- [17] 李杨.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90.
- [18]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 3 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01.
- [19] 何士光.何士光文集:第 1 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 [20]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3.

The Issue of Sanitation and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orerunners” in the Local Novels of the 1980s

Lei Ming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rural forerunne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usually believes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national mainstream ide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 narrative, lofty aesthetics and idealism. However, the local novels in the 1980s were rich and complex in shaping the “rural forerunners” in the reform era. The local novels in this period created the image of “rural forerunners”, focusing on the hygienic habit. The novel narrates that the forerunners challenge the rural tradition by “brushing their teeth”; The writer writes that they smell fragrant because of their hygiene, so as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 orientation of “forerunners” who agree with the reform; It depicts the clean state of the clothes they wear and represents a new cultural awakening. The hygienic habit has become an ideographic device for shaping “forerunners” and conveying the demands of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retained many rural life information in the 1980s, and thus constructed a new mode of life and humanity for shaping “new people in rural areas”,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local novels; “rural forerunners”; sanitation;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采薇